

比较

2016年
第4辑

总第85辑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吴敬琏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楼继伟

构建有利于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洛瑞塔·梅斯特

最新通胀走势及其对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挑战

帕特里克·博尔顿

金融约束与主权融资

黄海洲

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

戴维·奥托

工厂自动化的历史与未来

考希克·巴苏

群体身份认同、生产率和福利政策对促进发展的启示

托马斯·皮凯蒂

一个更平等社会的现实愿景

钟正生 张璐

货币政策转型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陶玲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的国际比较和评析



比较

总第85辑

2016年第4辑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吴敬琏 主编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马媛媛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执行总经理 张翔

助理总经理 汪弘彬

发行总监 邱道姗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6 号楼5层 (邮编：100027)

卷首语

主编吴敬琏近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问题,用现有的知识可能对付不了,我们需要打开眼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科学的进展”。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把我们推到了世界经济第二,身处世界,体量巨大,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什么样的情景,都需要放在世界中进行思考、比较、探索。本辑《比较》呈现给读者的是国内外学者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开篇是主编吴敬琏教授根据“长安讲坛”的演讲修改而成。他深感当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缺乏共识,于是,综合国际经济学界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文献,梳理国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明确的定义:“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体制机制架构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为推行这样的结构性改革,他提出了六个需要抓紧推进的改革任务,为推进这些任务必须消除以下三个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执行改革的责任主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应该得到落实。

楼继伟的文章是他在“G20 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全球经济正处在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G20 各国应当站在全球角度密切关注税收发展动向,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加强税收能力建设,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金融危机后的八年间,各主要经济体一直在运用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提振经济,不少学者担心通胀的隐患,现实却是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兼 CEO 洛瑞塔·梅斯特的文章正是针对危机后通胀变化的新趋势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新趋势对学术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带来的新挑战。她回顾了美国、英国、欧元区以不同预测指标和模型测算的近期通胀变化趋势,分析了这些预测指标和模型在预测通胀时的优势和局限。她特别强调了通胀预期的重要性,因为通胀预期在通胀动态变化和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学界和政策界对此研究依然不足,对通胀预期如何形成、谁的通胀预期会影响通胀预测和货币政策制定,并没有确切的了解。她鼓励研究者推进这方

面的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为好的政策制定创造条件。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现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帕特里克·博尔顿的文章是他2016年初在美国金融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这篇文章以博尔顿和黄海洲的国家资本结构模型为基础,将公司金融学的资本结构理论拓展至用于分析国家层面的货币政策和主权债务。他将国家的法定货币和本币债务类比为公司股本,国家的外债类比为公司债务,由此在股票融资的股权稀释成本和本币融资的通胀成本之间建立起平行关系,进而可以分析一国如何在外部债务和本币债务融资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最优的融资方式。他在演讲中还将这一独特的分析方法拓展至探讨货币理论、外汇储备管理和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得出了很多颇有启发的观点和政策含义。这一研究开启了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金融的新框架和新思路,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方向:例如,债务积压与国家债务的本外币结构之间有什么关系;国家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治理问题。

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局部性危机时有发生。黄海洲的文章从全球货币体系寻锚这个新颖视角,来分析全球经济当前的困局和未来可能的前景。他回顾了20世纪的两度全球货币体系大调整和寻锚:1929—1933年大萧条直至“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第一次大调整和寻锚;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直至1985年五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和1987年七国集团达成《卢浮宫协议》的第二次大调整和寻锚。这两次大调整和寻锚所经历的时间惊人得相似,都是16年,其成功都促成了世界经济长达20年以上的黄金增长时期。这期间的历史经验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三次大调整和寻锚过程。各国如不协同合作,全球经济复苏将更加艰难,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和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生命代价可能无法估量。第三次寻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达成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引领的新“广场协议”,以稳定全球汇率体系;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并举,稳定通胀和增长预期。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从而参与并引领第三次大调整的相关谈判,成为被世界认可的又一个标志性经济金融强国。

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无人驾驶汽车、高级机器人等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新一轮关于人类将被机器替代的担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的文章回顾了過去两百年来工厂自动化和就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以美国为例分析了自动化对就业市场两极分化和薪酬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从“波拉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的角度,阐述了过去数十年和数个世纪里,自动化并未完全替代大部分人类工作的原因;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最近和未来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未来职业变迁和就业增长轨迹。在他看来,很多情况下,机器和人类劳动力的关系是既取而代之,又相辅相成。只关注自

动化或人工智能造成的损失，会忽视自动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核心经济机制，即只有工人能完成的任务才更有价值。

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的文章主要讨论标准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体身份认同。巴苏认为，人的组织和社会归属感对于提高人的能力或生产率进而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他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论述了群体身份认同，也即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他的生产率以及他在经济上的表现。借助模型的分析，他讨论了基于群体身份认同的扶持政策 and 减贫政策，并将这一分析视角扩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减贫、经济发展和国际政策协调。

“法和经济学”栏目主要从法律和监管角度讨论近期引起颇多争议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投资问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田静结合我国现行保险产品监管规则和经合组织以及英美对具有投资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监管，讨论此类保险产品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以及未来监管应当加强的方向。

“新书架”栏目是托马斯·皮凯蒂的书评，所评论的是其导师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新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皮凯蒂在这篇短小精悍的书评中，首先概述了阿特金森的学术生涯及其做出的学术贡献。随后，他对阿特金森提出的政策做了点评，包括累进税、国民保险、遗产税、让国民获得资本和所有权以缩小不平等的国民储蓄计划等。皮凯蒂还指出，阿特金森的著作有一个瑕疵，就是太过执着于英国，但他认为这一瑕疵恰好也是一个主要优点，它说明“胆小的政府没有不作为的真正借口，因为它仍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

钟正生和张璐的文章借鉴美国和韩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经验，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当下状态和未来前景做了翔实分析。他们认为，虽然间接融资目前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继续存在的现实基础，但随着外汇占款流入的减少甚至转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有萌芽迹象，央行着意构建利率走廊正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转向真正的利率调控，还需从两个方面深入推进：一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尤其要解决准入壁垒高、竞争程度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解决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对资金价格不甚敏感的问题。美国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货币政策的转型，不只是技术上的“顺水推舟”，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伤筋动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陶玲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的研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个时期主要风险预警监测方法进行了描述和对比分析，概述了这些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局部到系统的演变特征。她认为，不同的监测预警方法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最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数据信息统计完备程度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于此，她对我国如何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目 录

Contents

第八十五辑

- 1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吴敬琏
What Structural Reform Is and Why It Is So Important? *by Jinglian Wu*
- 12 构建有利于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楼继伟
A New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for Strong,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Global Growth *by Jiwei Lou*

政策评论

Policy Review

- 18 最新通胀走势及其对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挑战
洛瑞塔·梅斯特
Recent Inflation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and
Monetary Policymaking *by Loretta J. Mester*

- 39 债务和货币：金融约束与主权融资 帕特里克·博尔顿

Debt and Money: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Sovereign Finance

by Patrick Bolton

- 68 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 黄海洲

The Third Round of Anchor Search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y Haizhou Huang

前沿

Guide

- 96 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工厂自动化的历史与未来 戴维·奥托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by David H. Autor

特稿

Special Feature

- 128 群体身份认同、生产率和福利政策对促进发展的启示

考希克·巴苏

Group Identity, Productivity and Well-be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by Kaushik Basu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46 我国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投资功能属性及法律框架 田静

The Nature and Legal Framework of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of New

Life Insurance in China

by Jing Tian

新书架

New Books

- 162 一个更平等社会的现实愿景：评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托马斯·皮凯蒂
A Practical Vision of a More Equal Society by Thomas Piketty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170 货币政策转型：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钟正生 张璐
Monetary Policy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China by Zhengsheng Zhong and Lu Zhang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9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国际比较和评析 陶玲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Approach on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Comparativ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by Ling Tao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吴敬琏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2015 年 11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

但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还存在不少争论。比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需求侧的强度不够，还是由于供给侧的效率低下？再比如，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到底是要改结构，还是要改体制？对于这些问题，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存在不同的意见。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自己对后一方面问题的理解，也就是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

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在从供给侧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导致效率下降。

* 本文根据作者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长安讲坛”（300 期）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阅。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力量,即劳动、资本和效率推动。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先所依靠的驱动力量开始消退,例如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改变,也就是所谓“库兹涅茨过程”(Kuznets Process)导致的效率提高也开始减速。与此同时,粗放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却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下降,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变化。

从以上分析得出的治本之策,就是通过资源的再配置,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供给侧的质量(效率)。

第二层含义的“结构”,是指体制机制的结构。“结构性改革”讲的,正是这后一种结构的改革。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这样做会造成十分消极的后果。

由政府直接“调结构”不但无效,还会产生反效果

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无疑需要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以便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效率。当前改善经济结构的重点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进行资源的再配置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和规划、政府的政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国民经济的企业、产业、地区等结构;另外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习惯于沿袭计划经济的传统,用第一种方式、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调结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方法“调结构”通常是无效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效果。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扭曲,效益受到损害,需要进行调整。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经进行过两次大的经济调整。在当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这种调整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比如规定哪些产业或部门应该缩减,哪些产业或部门应该增强,然后用行政指令或诱导政策促其实现。在原有体制下由政府进行结构调整的根本问题在于:结构扭曲往往就是由体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

而且政府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因此，调整通常会产生两方面的负面结果：一个是由于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即使调整到位，也并不能建立更好的经济结构；另外一个是由于造成结构扭曲的体制和政策因素并没有改变，一次调整过后要不了多久，旧的结构重新复归，又需要进行另一次调整。

在当时的情况下，市场还没有生长起来，政府处在资源配置的绝对主导地位，因此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结构调整，自然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后来通过80年代中期的初步改革和90年代以后的系统性改革，市场逐渐成长和发育起来，但是许多政府部门认为用行政命令那只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整，才能很快见效，所以，在90年代甚至直到21世纪，各级政府仍然偏好用行政手段调整结构，结构扭曲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004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对于宏观经济到底是“全面过热”还是“局部过热”，发生了争论。当时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没有发生过热，也不赞成采取总量紧缩政策，说是“股市刚刚起来，不能一盆冷水泼下去”。第二种认为出现了经济过热，主张采取紧缩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最终导致崩盘。不过这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领导接受。被肯定的是第三种意见，即认为中国经济只是出现了“局部过热”，而并没有发生“全面过热”，因此，只要采取措施抑制“过热部门”的扩张，就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国务院颁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家发改委也随即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把产业划分为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要求采取“有保有压”和“有扶有控”的措施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对所谓“过热产业”进行控制和清理，另一方面对政府选定的产业进行扶持。这种“有保有压”和“有扶有控”的调整并没有见效，经济结构的扭曲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在2006年3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指出钢铁、电解铝、电石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要求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有保有压，“坚持扶优与汰劣结合，升级改造与淘汰落后结合，兼并重组与关闭破产结合，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文件虽然也提到要深化改革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依然停滞，实际上主要采取的办法是按照指令性指标“淘汰落后产能”。因此，结构调整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比

如钢铁行业是2006年化解产能过剩的重点产业,可是调控的结果却是越调越多,全国钢铁产能从2003年的2.5亿吨左右提升到2012年的10亿吨左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除了面对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之外,还遇到GDP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这时,除了“扩需求、保增长”外,国务院还做出决定,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经济工作之一,要求用财政、金融和其他手段大力扶持七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用补贴、政策优惠来扶持指定产业造成价格信号扭曲和成本失真,使得光伏、LED等受到各级政府扶持的产业很快也变成了产能过剩的产业。

于是,2013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连续发出七个文件,要求对一系列“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进行治理。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要求通过五年努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达到产能规模基本合理、发展质量明显改善等目标。

总的来说,用行政手段解决结构扭曲的问题,效果很差,有时还适得其反,过剩产能越调越多,而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却往往成为新的产能过剩产业。

转变发展方式长期未能见效的根本原因在体制

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21世纪初才提出来的新要求。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几十年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包括多项改善产业结构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它们的贯彻,“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95年制订的“九五”规划(1996—2000年)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改善经济结构。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后来2007年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3年讲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针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但是多年来成效不大,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汲取。

由于“十五”规划(2001—2005年)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出现了反复,经济结构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引发了2005年到2006年制订“十一五”

规划（2006—2010 年）期间的一场要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这一转型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当时说的体制性障碍，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在参加这次大讨论的过程中写了一本书——《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年初版，2008 年增订）。书里介绍了当时讨论的情况。对于为什么增长模式转型、结构调整不能取得预期成效，列举了很多具体的原因，比如把 GDP 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等等。归结起来，就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或者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抑制甚至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三去一降一补”也要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经济目前面对的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需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来实现资源的再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不论过去的历史经验还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告诉我们，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这里，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有准确的定位。

为什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三去一降一补”要靠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这是因为：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能够建立起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说到底，“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靠这两个最重要的机制才能够实现。市场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确激励机制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它们是行政手段所无法做到的。比如要压缩钢铁业的过剩产能，老办法是由行政机关规定计划指标，要求限期压缩多少万吨“落后产能”，然后把计划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企业。压缩任务通常只能按企业的大小、设备的新旧等“硬指标”“一刀切”，否则就压不下去。然而根据这样的标准，被切掉的往往并不是效率最差的设备和企业。而且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甚至纵容企业增加产能。再比如“补短板”的实质是加快效率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用行政的办法也跟市场激励的办法很不一样，主要靠政治动员和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

信贷政策、补贴政策去扶持一些政府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和应当做强做大的企业，和依靠市场机制奖优罚劣与实现优胜劣汰，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当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呢？据我理解，所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不要落入过去政府包办一切的老套路。政府要做的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操控市场和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当然，它还要在一些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比如说用社会保障体系来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进行托底，支持基础科研，建立基础教育体系，等等。总而言之，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企业的经济决策。

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如果说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要完成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必须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即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国在20世纪末宣布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体系还不完备，其中许多重要的子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已经初步建立，也还很不完善，存在诸多缺陷。总之，还不足以承担有效配置和再配置资源的重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通过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及其法治基础建立和完善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中央领导又提出了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提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国家文献里常见的说法。我查了一些文献，在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时，这种改革就被称为“结构性改革”。我们习惯于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改革叫作“体制改革”。当这个短语被译成英文的时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结构性改革”来表达。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最早接触“结构性改革”这个说法，大概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论战”中中方的批判文章里看到的。当时的批判文章指称，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主张对西方国家进行“结构改革”，这意味着改良主义和对革命的背弃。后来接触得更多的，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一再提出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最近的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公报，也提出20国集团各国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总之，结构性改革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来指称局部性改革的概念。既然中国已经宣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要对其中部分架构进行改革也是应有之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当前要进行的改革，也是完全可以的。

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对我们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比如说，我今天讲演的题目，就是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What Structural Reform Is and Why It Is Important”（“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借用来的。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建议一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当时的IMF研究中心主任拉詹（R. Rajan）写了一篇短文来解释他们所建议的改革，题目叫作“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那么难”（Why Are Structural Reforms So Difficult?）。^①文章说，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带来的益处是长期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人会受损，所以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我在这里要说的不是结构性改革的难易问题，而是拉詹对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所做的言简意赅的界定。跟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有些人认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于需求过剩或不足造成的。拉詹表示不同意这种判断，他指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支配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这就是说，结构性改革是对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进行的改革。

总之，需要明确的是，“结构性改革”讲的是针对体制机制架构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作

^① 中译文载《比较》辑刊2016年第2辑，总第83辑，第1—4页。

用的发挥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六个方面的改革需要抓紧推进

为了完成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宏伟任务，我们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了 336 项改革任务，其中直接跟经济有关的就有 200 多项。这些任务当然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最近各界人士提出的一些迫切需要重点进行的改革项目，我认为以下六个方面的改革特别需要抓紧进行。

一是简政放权的制度化，加快制定和执行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市场进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根据企业和公民个人“法无禁止即可为”和各级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国务院部署制定两个清单：一个是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一个是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看起来比较困难，但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加快进行。这不但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还牵涉到对外经济关系，比如在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中，这就是一项重要议题。

二是全面推进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核心议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仅有这两项重要的价格改革还不足以保证整个金融体系改革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加快。比如说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从事前的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的合规性监管为主，就需要加快实现。在当前杠杆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方面民间的投资意愿低落，另一方面由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人们不愿意把资金放到流动性比较低的实体经济。此时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是国有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因为虽然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但它掌握着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它所处的行业又往往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居高临下地位的制高点。目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且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较快改变，就会拖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要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才能实